

doi: 10.3969/j.issn.1007-6522.2018.02.007

文人士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 革命实践与话语表达

常利兵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太原 030006)

摘要:建国初期,各类知识分子不断奔赴各大新区参加土改运动,并写下了大量观后感、日记、工作笔记等,凸显了土改与知识分子之间多重复杂的历史关联。土改作为一种革命实践,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并由此建构出了一套话语,以表达对新时代、新政权的认同和思考。在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总制约下,文人知识分子群体对土改的认识和看法,不仅有积极主动,也有难以适应的无奈、困顿,于是呈现出了同中有异的实践表达。这既是知识分子在走向新中国时的历史遭遇,也是革命年代的一种折射。

关键词:土改;知识分子;革命实践;话语表达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18)02-0079-18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一个全面破旧立新的革命时代。从旧时代步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到新区土改运动中,本文将这一典型的革命实践称为建国初期的文人士改。从内容上看,它由土改和知识分子两部分构成。现有研究对此问题分而论之,要么是就土改谈土改,要么只是将土改作为讨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事件背景,鲜

有将两者视为一个革命性的大事件进行系统研究。

土改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研究者多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中心,土改实践只是被视为改造的手段,凸显的是一个从外向内的被动性过程。^①但是作为一个行动主体,知识分子在土改运动中也必定会产生一套话语与观念,这是一个由内向

收稿日期:2017-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2&ZD147)

作者简介:常利兵(1976-),男,山西泽州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社会史。

^①主要成果有杨奎松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谢泳著《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周兵《社会实践与知识分子教育和改造——以建国初(转下页)

外的土改认知过程,往往呈现出主动和被动相互交织的态势。作为建国初期新区土改事件的亲历者,各类知识分子写下了大量记录土改运动的观后感、日记、工作笔记等,这些文本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本文关注文人士改,试图从当时知识分子参加土改这一革命实践过程来考察他们是如何看待土改的,对新时代新政权表现出了怎样的思考和认同,这些总体性认识又对其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也是一个革命实践与话语表达的双向历史展演过程,前者进入客观世界,后者则彰显出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的外力作用下所作出的回应。

此外,对本文中的知识分子概念略作说明。据建国初统计,全国约有各类知识分子200万人,包括三类:一是投身革命,经过战争锻炼成长起来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核心和骨干,主要从事党、政、军或其他行政组织工作。二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类学者、文艺工作者等。他们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尚未走出校门的高校青年学生。^{[1]212}文章以第二、三类知识分子为讨论对象,他们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是知名知识分子。当这些旧时代知识分子

进入新时代后,便遭遇了新区土改运动的革命实践,由此形塑了他们的土改话语表达。这一革命语境中实践与表达的相互关系生成即是本文关注的焦点。索维尔认为知识分子概念的核心是“理念的处理者”,即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主要工作是处理理念,这些人有作家、学者等。^[2]而本文对知识分子的讨论,主要是考察他们在土改实践中是如何展现自我的。

一、到实践中去:知识分子进入土改现场

新中国成立时,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约占全国面积的1/3)已完成土地改革;而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约占全国面积的2/3)的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没有解决。至于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先后分三批完成:第一批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在约有1.2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二批从1951年冬到1952年春,在约有1.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其余3000万农业人口的地区,于1952年冬到1953年春作为第三批完成。^{[1]120,126}此外,华北境内还有部分新解放区,包括北京、天津城郊和河北、山西、察哈尔等地区,1949年冬开始实行土改。^[3]可见,建国初期新区土改的范围涵盖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

(接上页)期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为例》,《现代哲学》2012年第3期,第49-56页;孙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89-96页;邵燕祥《我与诗与政治——诗与政治关系的一段个案》,《西湖》2007年第1期,第68-78页;许纪霖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袁小伦《生死关头:民主人士与土改运动》,《书屋》2002年第8期,第22-28页;朱地《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93-99页;黄平《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的经历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转引自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07-425页。

等几大行政区。^①文中所讨论的知识分子进入的土改现场也主要分布在这些区域范围。

首先是知识分子到北京市郊参加土改的情况。1949年10月,北京郊区进行第一批土改。中共中央华北局作出决定,动员大学生和教师参加土改工作。著名画家徐悲鸿写信给周恩来,要求派师生参加京郊土改并写生,^[4]这一请求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由此,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师生拉开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的序幕。^[5]1949年12月,在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支持土改。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会上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与土地有联系,他们在土地改革的斗争中是动摇的,但是他们的立场是可以经过教育而改变的,我们必须事先向他们进行土地改革的教育,争取他们积极参加或支持土地改革的工作。”^[6]北京高校也利用寒假时间有组织地动员师生参加京郊土改。1950年1月,冯友兰偕夫人参加土改工作队,先后在丰台等地参加土改。^[7]他回忆说“学校号召全校师生参加工作组。我报了名,叔明也报了名。我们的工作区域是卢沟桥及其附近村庄。全组有十人左右,一直到过了春节才把这一带的土改搞完。”^[8]^[17]据报道,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北京高校约有800名师生参加了京郊土改。这一人数是原来京郊土改工作干部的两

倍。^[9]在高校师生积极参加土改的同时,政府也开始组织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京郊土改。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在现有工作人员中抽调72人参加京郊第二期土改工作,以对其进行教育改造。^[10]

从现有资料看,京郊是建国初知识分子参加新区土改运动中最早的地区。此时的土改实践似乎并未专门强调它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间的必然性关系,主要出发点是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支持土改。但随后在其他新区土改中,知识分子参加土改与自身思想改造问题则越来越密切地关联在一起了。这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新区土改中均有体现。

1950年6月30日《土改法》颁布后,全国新区的土改运动全面推进。随之,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部门和机构纷纷组织各界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分赴土改第一线。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决定,由各民主党派号召和动员其成员积极参加土改工作。在1951年5月至1952年2月间,先后组织了文教、科技、医务、工商、宗教各界人士6107人,分成47个土改工作团和5个土改参观团,分派到全国各地。7月1日,民盟总部发表声明,拥护《土改法》,号召广大盟员踊跃参加土改工作。据记载,天津民盟动员和组织盟员积极参加土改工作,先后有孟秋江、张国藩、张琴南、杨思慎等40多位盟员参加土改工作团,到中南、华东和西南等地参加土改运动。天津民盟另组织

^①在当时的行政大区中,华东地区,包括山东、苏南、苏北、皖南、皖北、浙江、福建七个省区和上海、南京两市。中南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个省及广州、武汉两市。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5个省。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及重庆市。参见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348页、356页、364页、371页。

了参加土改工作归来的盟员进行座谈,向民盟内外知识分子作报告,谈经受考验和锻炼的心得体会,听众累计25 000余人。^①

九三学社社员大多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封建土地制度有着不同程度的历史关联。因此,广大社员在政府、各级政协及社中央理事会和各地方组织的号召和领导下,一方面加强学习有关土改的指示,另一方面则以实际行动积极报名参加或参观土改工作。北京社员第一批参加了中南区土改工作团及赴上海、皖北、西北、河南等地的土改参观团。初大告、严济慈、汤藻真等参加了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一团。裴文中等10人参加了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团,裴本人任该团副团长,并勉励其他人要放下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向农民学习,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土改问题,努力在实践中锻炼成为人民的知识分子。到1952年底,共有34%的九三学社社员先后参加或参观了土改工作。^[11]

与此同时,各地方动员和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的工作也蓬勃开展起来。1950年10月,中南区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学生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南区各校师生,尤其是文法、师范各科的师生于1950年冬至1951年春利用寒暑假参加土改工作。^{[12]111-112}

1950年12月,广西桂北地区进行土改试点,中共桂林地、市委先后向广西大学文

教、法商学院抽调130多人参加土改运动。1951年1月至2月底,寒假留校师生员工620人利用寒假组成土改参观团,分别到兴安、灵川县参观土改工作。10月28日,文教、法商两个学院的师生共579人又组成土改工作团赴钦廉地区参加土改工作,后于1952年6月初返校。6月16日,土改工作总结大会表彰了在土改中立功的师生133人,其中甲等功9人,乙等功46人,丙等功78人,并宣布批准12名优秀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2月,工、理、农三所学院的师生1276人,又分别到永福、兴安等县参加土改复查,于3月10日返校。^②

1951年2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8所高校教授31人组成的华东区土改参观团到苏南参观土改工作。他们先后在上海、苏州等地听取了各级负责同志有关土改问题的报告和情况介绍,并分组深入农村,参观了吴江县平望、盛泽、震泽三个区的土改工作,历时近一个月。其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也先后来到苏南参观土改工作。据统计,苏南以外的各界人士参观土改工作的共有232人。^③另有北京其他高校的63位教授也组成3个土改参观团,其中雷海宗、吴景超(团长)、朱光潜、贺麟等人参加了西北区的参观团。^[13]

1951年4月,上海市郊区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大学教授、讲师、助教参加市郊土改问题》的通告,开启了知识分子到

①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委员会编《历史的足迹:天津民盟史录1950-2002》,天津:天津市武清区丰华印刷厂,2003年,内部资料。

②参见广西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广西大学校史1928-1988》,由广西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发行,1988年,第160-161页。

③中国共产党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改文献》,1952年。转引自谭志云《苏南土改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37-41页。

市郊参加土改的实践工作。据记载,到上海市郊参加土改的教授有108人,组成了一个大队、十个小队,分别到七个区的十个乡参加土改工作。由大学教授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沪郊土改工作组于6月9日至11日分组学习了城市郊区土改的方针政策,并听取了上海市郊土改委员会委员、市郊农民协会主任张耀祥关于郊区土改进程和各阶段工作要求的报告,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冯契教授参加浙江农村土改工作的工作体会。6月15日,他们分别到市郊各乡镇参加土改。^①

1951年8月,四川省剑阁县开展土改运动。到此县区参加土改的有中央土改工作团西南区第九分团99人,川北区党委工作团408人,剑阁地委干训班253人,以及中江、三台土改参观团170人,再加上本县抽调的其他干部、教师,共有1735人。10月29日至11月20日,为进行土改总动员,土改扩大干部会议在县城召开,有干部、选派教师和农民积极分子参加。11月23日,全县土改运动工作队进驻村庄。按照《川北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整个土改过程分为“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反违法斗争,没收征收,分配土地及胜利果实和结束工作”6个阶段进行,历时145天。^[14]

1952年1月,南宁市中等学校师生组成两个工作团,到附近县区参加土改。时任第一团团长的舒芜在回忆录中指出:“事实上不过是利用寒假,去‘参观’土改,接受教育。那次参加土改,自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至二月二十七日,我记下了较详细的日记。

第一天的日记就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回顾这五年,应该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五年,首先要感谢党的教育,人民的教育,我觉得过去那些糊涂观念,虽然当作了不起的真理,坚持了那么久,今天看起来,实在是可怪诧的。”^{[15]697-698}

以上叙述的是1950年《土改法》颁布后,各界知识分子到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地区以工作团的形式参加或参观土改运动的大致概况,从整体上反映出了当时知识分子投身于土改革命实践的时间、地域、规模、数量、组织等情况,为进一步分析他们的土改话语表达提供了基础。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进入土改现场的历史图景,再以萧乾和邵燕祥为例做些具体说明。萧乾在其自传中就参加土改一事有详细叙述,他说“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土改是1951年冬天才开始的……国际新闻局为了对外报导,提前在1950年冬天就派我先到湖南去参加并采访那里即将进行的试点工作。任务是写一批文章向广大世界,特别是亚非拉,说明中国的土地改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非改不可,以及怎么改法……因此,我的任务不仅是报导,更是通过实例来示范。我首先来到长沙,接待我的是省委宣传部部长兼《新湖南报》主编李锐。听说要向国外报导土改,他们更是重视,立即为我送来一大批文件,其中包括政策指示和工作报告,有正面的范例,也有出现的偏差。他们让我从容地、仔细地看,说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研究讨论。我打定主意尽快地掌握这门学问,好下到基层。”^[16]

①《上海市协商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参加市郊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L1-4-35。转引自李红、史大军《参与和改造的双重身份语境——建国初期沪郊土地改革中的知识分子》,《皖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萧乾在土改实践中,先后写出了《我认清了阶级:上岸村斗争会归来》《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土地回老家》《生活在怎样伟大的时代》等多篇土改特写的报道文章,^①并以《土地回老家》为标题结集出版。他在“附言”中强调说,这“不是艺术作品,因为在这里创作必须服从报道,人物发展必须服从过程环节。这只是土改文件的一种例证。它本来是为对外宣传写的。我是初次参加土改,真正在农村活动的期间还不到一个月,而且又是在语言风俗两不熟悉的湘北,我的观察和体验都十分浮浅,文字是异常粗糙,内容也会有不妥的地方”。^[17]此时萧乾的话语中并未刻意强调参加土改即是为了思想改造。但《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和《生活在怎样伟大的时代》两文中已凸显了自我改造的意图。后在《土地回老家》再版“附记”中,他又明确地说“尽管粗糙,这毕竟是我解放后第一次的习作,带着自我改造的迫切要求去采访来的。”^[18]

邵燕祥则根据参加土改时的笔记写了一篇回忆性长文《1951年到甘肃》。据其回忆:1951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的第二期土改工作团,除天津组成5个团外,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及北京市各单位组建了26个团,共3139人。而他所属的西北两个团共224人,其中党员40人,团员55人。^{[19]7}10月10日,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作统一思想动员报告,主要强调:土改作为阶级斗争,是农民阶级起

来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运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和平土改是不可能的。土改基本上是解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满足其利益,对地主阶级不能留情。贫雇农不好动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特别是贫雇农格格不入,小资产阶级倾向于支持中农做领导骨干。上面下去的干部,有时先有一种调和妥协的思想,以后遇到问题又会“宁左勿右”,左右摇摆。10月18日,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柴泽民讲土改的方法与步骤,着重指出“一定要到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以后,再交代具体政策,否则会使群众缩手缩脚”。10月21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欢送大会上说“纠正过火偏向,一定要在自己人当中进行,不可在地主面前泼农民的冷水,灭自己的志气,长他人的威风;限制农民的口号切不可提。”柴泽民回答问题时说“群众发动起来,在气愤的情况下,打了几下地主,不算错误;但唆使群众这样做,就不合乎政策了。”^{[19]8-9}经过必需的政策学习,邵燕祥随西北土改团于10月25日前往甘肃土改现场,而此刻他感到“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19]10}

由上可知,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奔赴土改现场,或参观或参加,或主动或被动,已然是身处一种无可避免的革命实践当中。那么,在此“土改狂潮遍地来”的历史洪流中,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或者说这些大多已有成熟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在亲临土改运动时又会如何表达自己的土改观感和认知呢?下文将对此展开具体讨论。

^①除了《我认清了阶级》一文是作者1949年冬参观京郊土改写的报导外,其他各篇文章都是在湖南参加土改一个多月的基础上完成发表的。之后,所有文章又结集成单行本《土地回老家》(平明出版社1951年)出版发行。详见萧乾著《萧乾全集》第三卷“特写·杂文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二、从实践中来:知识分子土改的话语表达

建国初期,一批批知识分子走向新区土改现场,不仅亲历了革命实践过程,而且用文字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表达了对“过好土改关”^①以及对新中国前景的认识与向往,也因此留下了大量以土改为话题的文本。这些经由旧中国步入到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手所书写的作品可谓研究土改史的另一种珍贵文献。这些发表于各类报刊、杂志上的土改言论,是当时社会精英阶层对新中国土改运动做出的多样化回应。他们的文字中虽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影响的时代印记,但从其言语中有可能揭示出土改话语表达背后的复杂面相。因为相对于农民而言,知识分子作为外来者在土改实践中会基于其固有的知识判断和当时革命环境而生成种种认识。所以,他们参加土改实践,不只是一个从改造客观世界到改造主观世界的从外到内的思想改造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内到外的过程,即对土改的革命实践形成一套主观性认识,这也就是本文所探讨的话语表达问题。

从搜集到的各类关于土改的文本来看,其内容都凸显了相当一致的官方话语下的土改叙事特点。显然,这与参加土改时各种时事政治、《土改法》、马列主义课程、毛泽东思想、社会发展史、革命史等内容的不断学习有密切关联。后文中我们还会谈到知识分子土改话语表达生成的复杂性问题,在此先讨论

其话语内容问题。

贺麟于1950年冬随西北土改参观团到陕西省长安县参加土改一个月,一年后又再次随中南土改团到江西泰和县参加土改半年。1951年4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参加土地改革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公开表示赞同唯物论,批判唯心论,认为唯物论者就是要尽量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调查体验。“我们一致反对走马观花或袖手旁观式的参观。我们检讨了抱‘社会调查’的目的来参观土地改革而忘记了与自己思想改造相结合的客观主义和专家主义的思想。一谈到阶级立场,大家更严重地决不愿以超阶级的立场来静观这场翻天覆地的伟大的革命斗争了。”^{[20]3}他总结说:不能只是参观土改,更要参加到土改中,在深入变革现实的实践中认识现实,改造自我,向人民和无产阶级靠拢;进而认识到唯物论才是认识事物和改造思想的根本方法,而土改的中心环节就是群众路线和阶级斗争。^{[20]3}

贺麟的女儿贺美英回忆说,她的父亲是抱着改变自己,适应社会大变化的态度迎接解放的。在美留学时,友人胡敦元曾对贺麟说过“做共产党,第一要改变生活方式,第二要改变意识形态。”此话对贺麟影响深刻,他虽然做不了共产党,但进入新社会后也要改变自己,不能做遗老遗少。“这时他才仔细阅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感到像年轻时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样,他觉得这

^①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中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通过这一关。”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27页。

本书把中国的问题真正讲透了。”^[21]由此不难理解贺麟积极投身于土改运动,并且放弃只是单向地“参观”,而要真切地“参加”到运动中去的原因所在。这在他的土改总结中也有明显体现:一是参加土改使其转向了唯物论,或者说世界观发生了改变;另一则是对土改本身作为一场阶级斗争深信不疑。当然,他是否真能够从其早已成熟定型的“唯心论”立场完全转向“唯物论”立场,或许仍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朱光潜与贺麟、吴景超、雷海宗等著名教授都是于1951年一起到西北参加土改的。朱光潜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土改观感:

我的观感很多,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参加土改使我认识了新中国的伟大,因而对她的光明前途起了极坚定的信心。这次参观西北土改,我的模糊的认识于是具体化了、明确化了。土改使农民翻了身,这“翻身”的意义在政治方面比在经济方面更为重要。其实在土改中我们随时随地都见出教育的用意。而且比学校教育来得更切实,更有效验。就这一点认识来说,土改也教育了我。我们从土改中所见到的说明了什么呢?如土改所例证的,这是一个健全国家的情况,仿佛像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有一股蓬蓬勃勃的生气周流贯注到全体中每一个肢节。从参观土改以后,我不但在理解上有这种认识,而且在情感上也有这种体会。我认为这是我这次参观土改的最大收获。^[22]

与上述宏观性的土改观感话语相比而言,朱光潜在《检讨请生富》一文中则详细讲述了土改工作组进村后如何调查和解决农会主任请生富利用职权贪污腐败问题的整个过程,借此案例阐明了他对土改的具体认识。即土改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发动

群众又必须从整顿农会干部、加强内部组织、建立群众对于农会和乡村政权的信任做起。土改不仅是经济的,尤其是政治的,土改后人民民主专政在乡村里“生了根”。总之,“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望见社会主义的光明远景”。^[23]

尽管朱光潜强调了土改对自己的教育意义,但其认识更凸显在对新中国未来光明前途的希望和寄托上,并将这一认识作为参观土改的最大收获。这种话语表达既基于土改实践经验,又超越了土改本身,由此上升到了对国家政权认同的高度。此种心境表露无疑会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引起较大反响和共鸣。与他一同前往西北参加土改的吴景超在《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中写道:

在解放以后,我也学过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但两年的学习,其所得似不如一个月的实践为深刻。以前谈土改,只有理智的内容,而现在谈土改,则添了一些感情的内容。以前只是冷静的分析,条文的推敲,现在则充满了对于农民的爱,对于地主的恨,把土改看作与自己血肉相关的一件事情。这是由于与农民共同参加反地主的斗争而获得的。理性与感情相融洽的认识,只有在实践中才可获得。

我们以后的工作,更要向人民靠拢,要与人民的事业打成一片。过去的研究常从兴趣出发,以后应当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人民的需要,在现阶段,是巩固国防,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我们的工作就应当配合和满足这些需要。从今以后,在毛泽东伟大的旗帜下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24]

作为西北土改参观团团长的吴景超,用社会学家的眼光对土改实践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决心在新民主主义时代里向人民看齐,并融入到人民的队伍和事业中去。但是,何谓人民?如何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与人

民的事业打成一片”?他对这些问题似乎还未有更深入的把握,也没有表白式的观感那么简单。

还有罗大冈跟随天津土改参观团到中南区参观土改后,以“土改观感”为题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他指出“我从一系列事实中认识了土改是农民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必须求其彻底,封建地主阶级必须彻底被打垮,农民大众必须彻底翻身。这是农民的希望,也是人民政府的政策。我从心里领会了‘工农联盟’的深切与伟大的意义。因此,这一次参观,深深地教育了我们自己,加强了我们的阶级观点,更明确了我们对敌友分界的认识。”^[25]现代诗人林庚在西北参观土改后,也颇有感触地写道:“土改是一个大熔炉,在这熔炉里烧毁了一切旧的制度,铸出了全新的社会关系。对于我这次土改的参观,无疑的,正是改造自己的好机会,让我在思想上更坚定明确,在感情上更靠近了劳动人民,在学习政策上更知道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些我过去如果只是抽象的认识,在这次就得到具体的体验。”^[26]此类土改话语表达还有很多记载,不便一一叙说。由此看出,亲历者对土改运动本身缺乏更多的理性认知,而主要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再次复述和置换。这也是把握知识分子土改实践与话语表达时需要注意的特点所在。虽然每个人对这一革命实践的认识有所差别,但囿于建国初土改运动的

政治语境,在总体取向上则缺乏一种反思性的思考特质。

不过,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进入土改现场前后表现出了难以适应的情形。吴冠中和舒芜的回忆自述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不一致性和复杂性。1950年冬,吴冠中被编入中南区土改参观团,到湖南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吴冠中在自传中指出,他读过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也了解平均地权及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因为没有读过马列主义著作,所以并不了解阶级斗争的实质内涵是什么。在湖南参观土改后,他才知道地主、富农和贫农的区别以及怎样去划分阶级,并试着使自己的工作能够符合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同行中的王式廓创作了反映土改斗争的画作《血衣》,这引起具有同样土改经历和主动向政治靠近的吴冠中的创作欲望。对此,他说在之前曾构思过《渡船》和《送葬》两幅画作题材,^①但“参观土改后,看了今天的农村现状,政治斗争的火热,这些构思中的作品便不能诞生,成为死胎,胎死腹中的母亲永远感到难言的沉痛”。^[27]之后,他又利用与一位北方老农偶遇的机会,创作了《爸爸的胸花》,试图反映土改后农村参军景象。让人意外的是,这幅作品仍是“反应不好,被认为是形式主义,改来改去都不行”。即使“后来又试画别的题材”,可“总说是丑化了工农兵”的形象。无奈之下,吴冠中感叹道“我夹在东西方中找不到路,与领导及群众隔着河,找不到

①其中《渡船》反映的是渡船上集中了白发老伯、缺牙大婶、黄毛丫头等老乡,还有猪、鸡、菜筐等,扁担纵横,苦难挤着苦难,同舟共济,这些作者的父老乡亲,被早晨的阳光照射着,他们在笑。或者风雨黄昏,几把黄布雨伞遮不住瑟缩的人们。作者从幼年到少年、青年,外出和回家,必须坐这渡船,这渡船美,这美是立体的,它积淀了几代人的肖像。《送葬》反映的是祠堂的大白墙前一群白衣人送葬,白衣白墙间凸出一口黑棺材,代代苦难,永远的苦难凝固在这黑色的棺材上、棺材中。见吴冠中著《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6-27页。

桥,连独木小桥也没有。”最后,只好“逼上梁山,改行作风景画的念头开始萌芽了”。^{[27]26-27}

显然,吴冠中对参加土改并主动迎合新国家需要所做的种种努力中充满着“意外之情”,着实感到苦恼。所以,即使他与其他知识分子都前往土改现场,但他的土改话语表达与前文中知识分子的观感却有所不同,难以融合到革命实践中去。也正是这一出乎意料的不同之处,让知识分子的土改认知问题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与王式廓所作《血衣》刻画的土改中农民控诉地主残酷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不同,吴冠中则始终难以超越其“温情脉脉”的一面,于是只能改作山水风景画了。

舒芜在晚年回忆录中对参加土改一事也颇有微词,表现了知识分子对土改实践的另类表达。舒芜去广西地区参加土改工作,他在1951年12月4日的土改日记中写道:“与刘宏部长、陆地同去邕宁县土改试点区陈东村团部,听他们总结。陈闲也来。晚,与陆、陈谈了很多……那天的土改试点总结报告,似乎不大精彩,室内又有些阴冷,陆地、陈闲与我都溜了出来,晒太阳闲聊。”^{[15]691}众所周知,土改叙事多是土改浪潮翻滚和广大民众振臂高呼的革命场面,而舒芜日记中却呈现了土改现场的另一种图景,由于它“不大精彩,室内又有些阴冷”,他居然可以溜出报告会“晒太阳闲聊”。在其他人都争相表明阶级立场并踊跃投身土改事件的紧要关头,舒芜等人的举止言行,无意间流露出了其与土改实践之间存在的“同中有异”的状态。

舒芜还指出,在动员参加土改、学习土改的工作中,从北京来的文艺界土改工作团团长艾青讲的不是土改,而是当时北京文艺

界的整风运动。他强调:大量知识分子虽参加土改工作,但成分复杂且缺乏革命锻炼,产生了许多不适合国家性质的东西。文艺工作是宣传工作,必须宣传共和国的领导思想即工人阶级思想,文艺界的自由主义空气应该结束了。艾青的土改动员讲话没有直接强调土改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但舒芜已觉得一切都要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了。“人的思想,人与人的关系,一切都是全新的,的确不应该再有‘化日光天里、前宵梦影残’的情况了。”^{[15]691}可见,舒芜在土改实践中的态度变化显示了知识分子身处土改时主动与被动、自觉与不自觉间的复杂纠葛。

相比之下,冯友兰到北京郊区参加土改后,对土改本身进行了阶级斗争史观的解读,对土改与自我改造关系的问题却未置一辞。他认为土改中首先须解决的问题是“谁养活谁”。从地主的立场看,地主有地,农民有劳动力,农民种的是地主的土地,生产所得两下平分,两者间形成的是一种互惠关系。土改工作组则反复宣传说,是佃户养活地主,不是地主养活佃户,如果农民不种地,地主也不会有吃的。冯友兰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地主们说‘地是我的’”,如果能驳倒这一前提,所谓地主与农民的互惠关系就转向了它的对立面而成为剥削关系了。他解释说“何以见得地是你的?无非是因为有国家法律的规定,你所靠的无非是国家法律的保护。可是在封建社会中,所谓的国家法律,就是你们为了保护你们的利益而制定的。农民革命就是不承认这种国家法律。既不承认这种国家法律,那所谓‘地是你的’就没什么根据了。你无缘无故分去佃户的劳动果实,你不劳而获,这就叫剥削。”^{[8]117}冯友兰认为在土改中的另一收获就是了解了剥削的真实意义,他说:

“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历史的分期也是以有没有剥削为标准的。社会主要分为有剥削的阶级社会和没有剥削的无阶级社会两种。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以阶级斗争消灭阶级,以达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这应该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这是没有人能否认的。^{[8]117}

可见,冯友兰的土改实践及表达既不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满怀激情,决心要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看齐,也没有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将自己割裂成一个“旧我”与“新我”,而是从历史唯物论的视角对土改实践作了一番哲理性分析。或者说,他试图以局外人的眼光解析土改的制度逻辑,这可能也是他认为知识分子参加土改革命实践理应做的分内之事。

建国初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到了土改浪潮中,这一革命实践必定会在他们身上留下各种各样的历史印记。这些印记的重要部分就是本文所讨论的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问题。毫无疑问,这些来自于土改实践过程的话语表达,既有自身专业知识背景和主观情感的一面,也离不开当时整个革命语境规制和形塑的另一面。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指出:“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28]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作为参照,可以把知识分子参加土改的历史实践看作是“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接触农村这个

外在世界;而他们的土改话语则属于“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并且是基于第一阶段感性材料之上的。那么,值得追问的是,知识分子在土改中的认知和表现是在真实地反映土改运动的革命过程本身,还是在彰显自我改造的成功,抑或是两者兼有且另有所指?在其背后又有哪些决定性因素?接下来就这些问题作一些讨论。

三、同中有异:土改实践话语的生成与反思

前文讨论了知识分子进入土改现场后的观感认知和表现,既有一致性发声,也有难以适应的情状。那么,这些同中有异的土改话语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提出此疑问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亲历者在自传、回忆录、日记等文本中对当年土改革命实践感知的一些反思和重估值得关注;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中多是将土改作为20世纪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场域,未能从更深处去探讨知识分子一旦进入土改现场后的各种反应,尤其是对其土改话语表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首先,对知识分子土改话语表达产生主要影响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土改前进行各种时事政治课程的学习和教育;二是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一些民主人士对《土改法》持有异议,这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统一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工作被迅速提上了日程。由此凸显了各种课程的学习对知识分子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造成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各高校在课程上取消了原有的“国民党党义”及“六法全书”等课程,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等列为必修课。因这些政治

课采取教师与学生一起学习讨论的形式,目的在于改造思想,确立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所以称作“上大课”。例如,社会学家费孝通作为进步教授之一,在清华大学担任“大课”教员,讲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燕京大学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由本校的进步教授严景耀、翁独健、赵承信以及新聘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翦伯赞、经济学者沈志远分别担任。^{[29]37} 费孝通在“上大课”的教学过程中,发现知识分子不时地流露出各种“延误政治”“超越政治”“改朝换代”“以暴易暴”等思想及言论。^[30] 有人说“大课是思想统制”,“我的思想很正确,用不着改造”。也有人说“我们既是四个阶级联盟,为什么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克服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有人说“我要用功学业课,没有时间搞这一套。”这些“思想问题”好像雪片一般飞来。^[31] 可见,面对一套新意识形态话语的课程学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接受起来并不轻松。

针对“上大课”出现的异议及“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学习重点不突出等问题,教育部在《关于华北区各高校本学期政治课教学计划的几点指示》中强调:“通过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树立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要改造思想,首先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2]109-110} 1950年9月29日,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号召知识分子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起人民的立场和工人阶级立场。^[32]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这些举措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课程学习起到了进一步的规训和强化作用。

1951年7月,教育部就高校中出现的“政治课”与“业务课”相对立现象召开专门讨论会,指出政治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进行系统的理论知识讲授,并联系实际以解决主要思想问题。随后教育部又对华北区各高校发出指示:取消“政治课”名称,将“社会发展史”改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与“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同为独立科目。1952年9月,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相关会议上强调“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授重点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随后,教育部又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规定综合性大学及财经、艺术、工、农、医等专门学院自1952年起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课程。这标志着建国初新型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正式确立。^{[12]109-110}

很显然,整个新型政治课程的教育和学习,就是向知识分子传输马列主义的世界观,而不再允许有其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有一切必须重新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检验和塑造。正如阎明所言:“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参加‘土改’运动,是继‘上大课’之后更加剧烈的思想改造的开始。土改不但要解决农村的土地制度问题,还有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功能,即具有‘土改’的作用。社会学者中有不少人先后参加了土改……这一次他们是被改造对象,特别是要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一切。”^{[29]37}

除了课程学习内容外,部分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对《土改法》持有不同意见,从而引起中央高度警惕,这对知识分子的土改话语表达起到了较大程度的形塑作用。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回忆录中即有详尽说明。1950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中心议题

是土改问题,中共中央向大会提交了《土地改革法草案》。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当性及相关方针政策。他指出,封建土地占有制度“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复兴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基本果实。^[33]对于《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刘少奇的报告,大部分民主人士在讨论中表示赞同,也有人表露出“和平土改”的幻想,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一些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和爱国起义将领对土改则表示怀疑、不满甚至抵触。他们说“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户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土改偏差很大”,“斗争过火”,“地方的农会常常被土匪流氓所把持”,等等。这些言论随即被看作是“在土改问题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34]710-711}由此,中共不仅分别约请相关人士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而且“对各种怀疑、反对土改的错误言论和幻想‘和平土改’的错误思想进行反复的说服教育”特别是“对攻击基层干部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有力批驳”。^{[34]712}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闭幕词则对解决土改问题争议,在政策把握上对统一各界民主人士的土改认识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说: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两个“关”。站在革命人民方面的就是革命派,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的就是反革命派,各级民主人士一定要“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就像过战争关一样也把土改

关过好。“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35]

此次政协会议后,各民主党派都纷纷发布了拥护、支持土改运动的各项指示和决议,并积极号召和动员其成员认真学习和遵守政府的政策法规,踊跃支持和参加土改运动,“更好地团结一致,为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而斗争”。^{[34]712}

上述各类政治课程学习和政协会议上围绕土改问题存在的争议及其解决,对知识分子土改话语的生成均产生了直接影响。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又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再加上当时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在社会上造成的各种紧张情势,也给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少压力。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对知识分子的土改实践及其话语表达产生了难以避免的综合性影响。金岳霖在一篇学习感言中这样写道“我们参加政治课,作讲员,作班教员,和同学一起搞思想。在城里开会,在学校开会,搞土改,办行政,参加全国性的运动。例如抗美援朝,定爱国公约,镇压反革命等。总而言之,客观的环境把我们从个人生活中慢慢地拖出来,送到半集体的生活中去……劳动观点,群众路线,阶级意识,理论与实际的配合等具体内容都在自己的工作中成为实在的东西。没有这样的社会实践,我们不会自动地从形而上的体系中跑出来的。我们不从旧的哲学中跑出来,新的哲学是无法接受的。”^[36]

此外,亲历者对参加土改运动的再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不适应之感。如邵燕祥指出“半个世纪以后,回顾我两个月的土改工作,初期发动群众这一步,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困难,此时全国大定,有了一年多时间的抗美援朝宣传,打破了农民对‘变天’的恐惧;加上共产党、毛泽东当时在农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土改中,群众表现出的政治关注,组织能力,特别是选举中的自觉,深深地教育了我……三十年后,我偶然想过,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否只有劫富济贫式的暴力剥削一法?但也只是一闪念,稍纵即逝了。”^{[19]20-21 28}他对当年“劫富济贫式的暴力剥削”土改运动只是“一闪念”间的质疑,透露出他对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几乎如出一辙的土改认知话语表达的自我反省,这对当时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心态的他来说却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才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日常生活里已经有了一种“被迫的自觉”,所有属于个人的感情都是卑微的,琐屑的。^[37]

画家吴冠中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说:“土改的时候,我参加了土改参观团……组织我们去参观土改,受阶级教育,告诉我们地主怎么样剥削农民的。我们看了以后效果相反,农村剥削也许有,但是并不明显,相反我们看到农民打地主,打得很厉害。有些老师也讲,并没有感觉地主那么恶。”^{[38]68}前文提到,吴冠中因很难创作出革命性的土改斗争场景,无奈只好改作风景画了。其中缘由也许在于他从土改现场并未看到地主对农民的可恶和严重剥削,相反,却发现农

民打地主打得很厉害。所以,他所看到的与意识形态话语下的土改实践可能存在差别,但当时的革命形势使相当多知识分子只是按照早已规定好的土改话语架构去表达土改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从吴冠中的忆述中即可看出文人在土改实践中难以言说的心态和情感。

吴冠中还提到社会学家潘光旦在思想改造上的行为表现,也很能说明土改革命实践与话语表达的一些特点。他说潘光旦被批判得很厉害,但潘在检查书中讲的几句话让他觉得很感动。潘光旦说“我到乡下去改造,农民看到我拿手帕,他们以为是丝的,其实是布的。后来我拿把烟来,让农民抽我的烟斗,农民看我抽的烟,说跟他抽的烟是一样,我感觉心里很愉快。”^{[38]68}就这么简单的话语,吴冠中为何会觉得“很感动”呢?很可能是潘光旦在土改中与农民打成一片的场景触动了他。不过,即使潘光旦在土改中积极与“人民的需要”站在一起,并按照“农村有封建势力——激烈土改斗争的必要性——土改后农村欣欣向荣”的土改政策框架写出了多篇土改运动文章,^①可最终还是成了政治运动中的牺牲品。

舒芜晚年也对自己的土改观感进行了反思。他在1952年2月22日的土改日记中写下了参加土改的几点收获,以备返校后作总结报告之用,即:(1)理论与实践;(2)动机与效果;(3)批评与自我批评;(4)劳动观点;(5)工人阶级领导。至于土改总结报告,他解释说“每一个问题,都是先讲几句理论,接着就说,根据这一点,今后就应该如何如

①这些文章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进步日报》《文汇报》《新观察》《新建设》等报纸杂志发表,后又以单行本《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潘光旦、全慰天合著)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52年出版发行。

何,不应该如何如何。”在舒芜看来,这些土改总结套路“还是学斯大林那种论法,把每一条哲学理论的是非,都落实到政治上的是非,落实到政治实践的一条标准、一条戒律”。^{[15]698-699}可见,他对土改实践的再思考凸显了其话语中含有的阶级斗争史观的政治色彩。而这样的认知思路在20世纪50年代初积极向党和国家靠拢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是极为突出的。

基于土改亲历者的反思,我们又该如何审视和重估建国初期文人士改的革命实践和话语表达呢?它们究竟承载了怎样的历史细节和时代话题需要去揭示和解读?现在看来,问题似乎并不简单。就像文论家胡平所言:

在土改时期的报纸、杂志上,后人看到的,在知识分子们的笔下,都是一片必要、稳妥的正面景象,倒是那几年官方的档案和毛泽东的文稿里,有披露这正面景象下面众多的非正面的真实。在有了近半个世纪的距离,使得现在我们可能有了长程的大历史眼光之后,再看这些多如牛毛的文字,我们便会察觉——正是在对地主、富农作为政治上的一个敌对阶级被打倒在地的一片赞同声里,绝大多数出身于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开始萌生政治上的原罪感……也正是对工农干部、农民阶级的一片无条件颂扬声中,知识分子得以存在的某种文化背景,开始摇摇晃晃,恰如大风中的一扇破门;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亦似时下充满投机气息的大陆股市,在大户常常突袭般地出货、散户一片深度套牢叫苦不迭之中,成交量急剧地萎缩。^[39]

胡平对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及其话语表达的解读,提醒我们要谨慎看待知识分子土改认知的复杂生成过程,进而剖析他们走向

土改现场前后所遭遇的各种内外因素的交叉影响。如有的知识分子积极运用阶级斗争史观来展现自己的一片忠诚,而有的在土改革命实践中则难以调适,感到困惑。所有这些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乡村的土改史还保留着真知灼见,似乎仍是需要多加讨论的话题。

最后,如果要对知识分子土改话语表达的生成特质作一概括的话,无疑是其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在土改革命实践中试图用马列主义唯物论的阶级斗争史观替代原有认识论后出现的一种总体现象。很多知识分子在或主动或被动的阶级立场上去否定“旧我”,塑造“新我”,无条件地去适应“人民”的需要,痛恨地主富农出身的“阶级敌人”。但是在总体性的一致状态下,也存在着不同的发声者,即使显得微弱,却凸显了一种同中有异的存在。而这一切,除其自身因素外,也是当时形势作用下的结果。

四、结语

以上所述即是本文对建国初期文人士改这一革命实践及其话语表达进行的考察分析,试图探讨知识分子与土改运动之间的深层关系,为土改史研究提供新视野。或者说,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土改运动的亲历者,他们对土改经验产生了怎样的认识和思考,进而对中共土改的合法性建构和土改知识文本的生产、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历史作用。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面对陆陆续续建立起来的种种制度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新式的无知之人或外行。这些制度以及包含在其中的资源与规则,是他们表现自己行动的环境条件,而他们在这些制度与话语的约束下的行动和思

想,不论是有意的还是违心的,积极的还是被迫的,又反过来构成了创造或完善这些制度与话语的实践。”^①实际上,建国后各类知识分子并不一定都成了“新式的无知之人或外行”,即便他们的土改实践及认知是在中共设定好的“制度与话语”制约下进行的,但也有一些难以适从的不一致的实践者和言语者。而正是借助于文人士改中有“正”有“反”的实践和话语表达,官方的那一套“制度与话语”才能得以不断强化和传播。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土改话语建立在土改现场的革命实践之上,但他们的经历并不是一种自然实践状态,而是在一系列政治安排中展开的。所以,这样的历史实践已经是被高度政治化的过程展演,并直接影响到了他们以土改为元素的叙事话语和观感认知,对新中国、地主农民、封建剥削等问题的讨论则多以此为准则。洪子诚在《材料与注释》一书中对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及原因进行的分析讨论,有助于理解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他指出“立场、站队的问题,那个时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世界被‘一分为二’,生活在‘一体化’的世界里,世界观、情感也强制性地要求明确站队。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两个阵营,革命反革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没有中间地带。”^{[40]271}由此看来,知识分子的土改革命实践和话语表达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立场、站队的问题”,而像吴冠中、舒芜、邵燕祥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奈或不适应,恰好说明了“中间地带”的急剧萎缩和不可能。洪先生还强调说,“自由主义作家”和知识分子(如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在当代的命

运遇到的矛盾和作出的反应,相对而言是较为清楚的;相反,那些不同的“左翼”作家(如丁玲、柳青、舒芜等)的当代命运就复杂得多,“那种各个层面的‘悖论’情境,值得做更深入的探究,对他们的遭际、命运的了解,也更有现实意义”。^{[40]287-288}这种对建国后文人知识分子的当代命运深处的内外理路的解读,对于土改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言行表现为何会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存在状态,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视角。

总之,本文所讨论的既不同于现有研究的就土改谈土改,也有别于单纯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研究,而是将土改与知识分子两者结合起来,并把土改作为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进入革命实践的历史场域,他们表现出来的复杂反应,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发声,更是那个革命时代的折射。

参考文献:

- [1] 林蕴晖,范守信,张弓. 凯歌行进的时期[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 [2] [美]托马斯·索维尔. 知识分子与社会[M]. 张亚月,梁兴国,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 [3] 杜润生. 中国的土地改革[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267-268.
- [4] 王震. 徐悲鸿年谱长编[M]. 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320.
- [5] 周兵. 社会实践与知识分子教育和改造——以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为例[J]. 现代哲学,2012(3):49-56.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90.
- [7] 田文军. 冯友兰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

^①黄平《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的经历探源》,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转引自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07-425页。

- 2003: 230.
- [8] 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 [9] 无作者. 首都八百教授学生参加郊区土地改革 热诚帮助农民翻身并改造自己[N]. 人民日报, 1950-02-13(3).
- [10] 无作者. 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干部 政法委员会抽干部下乡参加京郊土地改革工作[N]. 人民日报, 1950-01-30(4).
- [11] 九三学社简史编委会. 九三学社简史[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8: 110-112.
- [12] 喻岳青, 谢维和. 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 [13] 胡尚元. 史学界的“大右派”——雷海宗[J]. 文史精华 2006(9): 31-39.
- [14] 四川省剑阁县志编纂委员会. 剑阁县志[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2: 184.
- [15] 舒芜. 舒芜集: 第八卷[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16] 萧乾. 风雨平生: 萧乾口述自传[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27-228.
- [17] 萧乾. 萧乾全集: 第三卷[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237.
- [18] 萧乾. 萧乾选集: 第二卷[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210.
- [19] 邵燕祥. 1951年到甘肃[M]//刘瑞林. 温故之九.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4-28.
- [20] 贺麟. 参加土地改革改变了我的思想[N]. 光明日报, 1951-04-02(3).
- [21] 贺美英. 回忆我的父亲贺麟及中老胡同 32号[EB/OL]. (2011-07-05) [2013-05-04].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618>.
- [22] 朱光潜. 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N]. 人民日报, 1951-03-27(3).
- [23] 朱光潜. 检讨靖生富——西北土改所见之一[N]. 光明日报, 1951-03-31(3).
- [24] 吴景超. 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N]. 光明日报, 1951-03-28(3).
- [25] 罗大冈. 土改观感[N]. 天津日报, 1951-03-27(2).
- [26] 林庚. 我在土改里的收获[N]. 光明日报, 1951-03-23(3).
- [27] 吴冠中. 我负丹青: 吴冠中自传[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2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2: 279.
- [29] 阎明.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 社会学在中国[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 [30] 费孝通. 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J]. 观察, 1949(2): 11-12.
- [31] 费孝通. 我们的大课 清华大学政治课的经验[N]. 光明日报, 1950-04-11, 12, 13(2).
- [32]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 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59-71.
- [33] 刘少奇.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2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226-247.
- [34]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 [3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25-28.
- [36] 金岳霖. 金岳霖文集: 第四卷[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13-22.
- [37] 邵燕祥. 我与诗与政治——诗与政治关系的一段个案[J]. 西湖 2007(1): 68-78.
- [38] 吴冠中. 谈文艺名家[J]. 文史参考, 2010(13): 67-69.
- [39] 胡平. 战争状态[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1: 372-373.
- [40] 洪子诚. 材料与注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Literati in Agrarian Reform: The intelligentsia'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Discourse Expressions in the early PRC

CHANG Li-b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various intellectuals went to the newly liberated area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mpaign for agrarian reform. The large number of reflections, diaries, work notes, etc., projected the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licated histor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agrarian reform and intelligentsia. Viewing agrarian reform as a revolutionary practice, the intelligentsia, actively or pass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form, established a set of discourse expressions that reflected old literati's approval of and pondering over the new regime in the new era. However, restrained from overall political ideology at that time, the literati as a class mixed their active, voluntary voices unanimously supporting for the campaign, with the voices of helplessness and frustrations in adaptation to the new situation, thus presenting a set of practice expressions characterized by general common ground while shelving differences. This was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encounters experienced by Chinese literati in the early PRC,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era.

Key words: agrarian reform; intelligentsia; revolutionary practice; discourse expressions

(责任编辑:魏琼)